

试论当代儒学复兴的三个面向及其可能性

吴根友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当代儒学复兴要在三个方面展开自己的新论述,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儒家应当基于传统的王道天下观发展出新的促进世界和平的国际政治理想;对于整饬人心而言,儒家应当基于传统的仁学思想发展新仁学思想理论,从而建立一个可与基督教理论相抗衡的精神与道德信仰系统。针对个人在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生活状态而言,应当发展出一套能为个人修身提供有效方法的道德实践哲学,从而发展儒家式的为己之学。

[关键词] 当代儒学复兴;王道天下观;新仁爱思想;修身

[中图分类号] B 222; B 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2)03-0018-06

伴随着亚洲社会和儒学的发源地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作为亚洲社会主流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也呈现出复兴的趋势。然而,在现代的工商业社会里,尤其是在欧美文化还占主流的世界文化氛围里,儒学复兴如何找到自己的现实生长点,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话题。20世纪中国大陆的第一代新儒家,港台第二代新儒家,分别是以拥抱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来重新发扬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而第三代新儒家仍然沿着前两代新儒家的基本思路,在学理方面继续展开与西方文化的对话来发展儒家的诸多方面的思想,如杜维明希望通过发展儒家涵盖式的人文精神来反思现代西方启蒙文化以来的人文精神。而且,杜维明还希望发展儒家式的“体知”的认识论模式,来与西方主客对立的认知模式的知识论相对照。成中英试图发展出儒家式的知识论的论述,在本体诠释学方面做出新的发展。刘述先借用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命题来诠释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与一元的文化共识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当代的活力与发展。

根据笔者的观点来看,当代儒学复兴首先应当回到先秦以降直到宋明儒家的核心精神理念之中,寻找对治当代社会问题的理论智慧,从而再来回应古希腊、基督教文明所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就现实世界的政治格局来看,当今国际社会国际法的

根本理念是发源现代西方个人权利论基础上的国家主权论;当今社会的人际关系的伦理基础是基于基督教教义基础之上的博爱、人人平等、个人自由思想;而当代社会里的个人心灵生活也主要是基督教提供的信仰上帝的原则。依此三个基本的粗浅论认识,我认为当代儒学复兴至少有如下三个面向:

其一,基于先秦儒家的“王道天下观”,发展出一套新的天下和平理论。

其二,基于先秦以及后来儒家不断发展的“仁爱”观,发展出一套与基督教可以对话、抗衡的人际关系理论。

其三,基于先秦及宋明儒学的心性修养理论,发展出一套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个人心性修养理论。

如果儒学诚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做到新发展,则儒学的复兴就会为全球化的人们带来福音。而且,作为地方性、区域性的儒学精神资源就可以转化成全球性的精神文明资源。我在这里所说的儒学复兴,并不是要成为取代其他文明形态的唯一学说。而所谓与基督教文化抗衡,也不是要成为取代基督教的一种主流的新文化形态,而是要成为全球化时代里诸子百家之一家,从而参与到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建设活动之中,避免当今全球化时代里基督教文化过分膨胀,并因此膨胀而有让世界文化单一化

[收稿日期] 2012-02-28

[作者简介] 吴根友(1963-),男,安徽枞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倾向。

一、“王道天下观”与当今世界和平的新思路

儒家的“王道天下观”，其思想雏型是孔子提出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思想。其基本精神就是由孟子、荀子所阐发的仁政精神，而以孟子的仁政思想为主。“王道天下观”的现代表达形式似乎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重新规定：

第一，将尊重人的个体生命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最基本前提。这一思想起点与西方近代社会发展起来的人权理论不仅不矛盾，而且比人权理论更为基本。在一国之内以及国际政治事务中，如果连人的基本生命都不能够得到尊重，何来其他的人权（财产权、思想与言论自由权等）。因此，要尊重人权，首先是尊重人的生命存这一最为基本的权利。所有的利益冲突与价值理想冲突，必须服从一个最朴素的直观真理——生命存在的第一性。因此，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原则应该基本相同，将尊重人的生命应该放在国际政治的首位。其次才是所谓的国家主权。要将卢梭、康德以来的抽象人权具体化，以最基本生命权作为抽象人权的基石，并作为国内、国际政治活动的伦理起点。

第二，所有的国际人道关怀仅限于人道的救援而不适宜于动用武力。特别是当不同的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信仰不同的时候，不能自居为真理的拥有者而对他方进行所谓的“圣战”。也不能以意识形态为由，对其他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危害其他国家人民正常的生活。因为经济封锁的直接受害者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封锁国家的人民而不是统治者。

第三，国际社会的局部战争仅限于这样的情况下是合理的：即当一国政府或少数族群直接侵犯另一国家和另一族群的生命存在时，由现行的国际组织授权，组织多国部队进行人道主义的维和行动。这正是儒家“王道”政治理想中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战争原则在现代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一种合理引申。当今的联合国固然不是当年中国的周天子，但联合国可以作为国际社会道义或正义的化身而履行人道的救援与有限度的军事维和行动。

最后，面对一个专制国家或其他形式的不民主国家时，只要这些国家不发动战争，就不应该以战争的手段推翻该国政府，而应当以经济、文化的手

段去唤醒该国人民从内部进行各种有礼有节的斗争，形成一种压力或吸引力，促使该国家或文明单位朝向更为人道的政治形式蜕变。即使不得已要对专制的与不民主的国家进行人道主义的维和行动时，其锁定的打击对象应严格地限制在对付该国的领导阶层和正在进行战争的战斗人员，不应该扩大到平民。战斗人员在受伤或被俘后，应得到国际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不应受到虐待（关于上一问题，罗尔斯在《族群际法》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讨论，此处从略）。

要而言之，建立新的国际政治伦理，是目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最为急迫的，是最为基础的文化建设事宜之一。尽管各国的国家战略将以各民族国家自身的国家利益为现实出发点，但仁道（或人道）的原则将是国内、国际政治的第一优先原则，人权论、国家主权论必须服从第一原则——生命存在优先的原则，否则，以人权论、国家主权论为由的国际干涉将是虚伪的政治欺骗^①。现代国际法体系基本上确立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地位；那么，新的国际政治伦理原则则需要明确规定民族国家的基本责任。仅仅讲权利而不讲人道、不讲责任的国际社会，必然要陷入“丛林法则”的泥坑，显然无法维持民族国家之间的长久的和平交往的。因为每个民族国家如果仅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必然会恶性地发展军事。最终，各民族国家就极有可能以武力方式来解决经济的争端。因此，新的国际伦理至少要从根本理念上确立负责任的“仁道”思想，在国际事务中，不是以强权的手段去强迫其他民族国家接受自己的文化理念，更不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打着维护自由、民主或其它形式的旗号而发动军事战争，而应当努力管理好自己的国家，敞开自己的国门，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和平、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其他民族国家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亲近更为合理的文明形态。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思想在今天将具有更大的启示意义。

二、“新仁爱”思想与全球化时代的人际关系伦理

全球化时代的人际关系伦理，其核心问题其实是如何重建人与人相爱的心灵秩序，通过此心灵秩序的重建而重建国际社会秩序。因为，没有内在的心灵的秩序，外在的社会秩序就没有人性的根基。

^① 以乔治·W·布什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联合国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基本上是由于一种家族、军火商和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的实现。

也许有人要问,为何全球化时代的人际关系伦理需要以儒家的“仁爱”思想为心灵的起点呢?我的回答是:经过现代文化洗礼之后的“新仁爱”更能适应东亚社会的普通大众的文化心理要求。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社会可以通过现代化后的基督教的博爱、人道主义的伦理来维系世道人心,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则可以活化儒家的“仁爱”思想传统来维系世道人心。而传统儒家的仁爱思想与传统的基督的博爱思想之间也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如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基督教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还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一切周济穷人,又舍己身以供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1]这些说法的背景虽然极其不同,但都强调了仁与爱对于道德行为的根基意义,以及人与人相处的爱的伦理关系。

1. 仁爱思想在科技时代的意义

相比较而言,基督教的心灵秩序是建立在人对上帝的爱的起点上的,通过对上帝的爱而使人人相爱。而儒家的心灵秩序是建立在人的“仁爱”之情的基础之上的。仁爱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之爱。仁爱虽然没有神的超越根据,但却有神圣的天作为超越的根据。人作为一个大类,在本性上是相近的,从开端处说,人皆有“四端之心”。人与天相通。尽心则可以体认人之为人的真正本性,体认人的真正本性后,就能领悟“天”的真正意义。在儒家的思想传统里,人虽然没有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却有上天赋予的“道德理性”。人若不能将上天赋予的道德理性展现出来,使自己行同禽兽,则是自绝于人类,因而他受到惩罚是咎由自取。传统中国与东亚社会的礼法制度秩序,其内在的心灵秩序起点就是“仁爱”。然而,这一思想传统已经被 20 世纪传来的西方文化以及现代工商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打断了,当代中国与东亚社会虽然有自己的外在社会秩序——各国的法律体制,但似乎还缺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内在心灵秩序。我们现在还很难说科学技术已经彻底地战胜了有神论思想,但有神论的思想必须不断地接受现代科学技术的盘问与考察,这是没有人能阻挡得了的时代趋势。犹太—基督教的一神论思想很难再像古典的中世纪那样成为普世性的信仰,尤其对具有自己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与东亚社会的人群来说更是如此。

现代的宇宙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将“一神论”的上帝从人知识论领域里放逐出去了,我们最多能达成的低度共识是:地球上的人同属于一类。在茫茫的宇宙中,我们不能断定是否有我们同类的智慧生物,除了我们必须和平共处的一个共同的地球之外,在可见的将来,我们没有其他可供居住的家园。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上帝在照管着我们,除了我们之间相互的爱之外,没有其他的出路。我们是同类,我们必须相爱。这是我们人类一切伦理、法律和制度的心理起点。因此,我们人类的心灵秩序在直觉上以“人与人的相互之爱”为起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这种相互的爱,是以不危害他人为底线,而以促进他人的发展为目的的关怀之爱,不要希望他人成为自己所理想的那样人物,而是希望他成为他自己所想成为的样子(当然不是为恶意义上的堕落,比如成为杀人犯,吸毒者)。每个族群、共同体、国家对于他者来说,皆是如此。因此,我个人认为,现代的中国人与东亚社会的希望正在于发扬儒家的仁爱精神,将以孝悌为起点的古典仁爱精神转化为现代的人道精神,以“仁者爱人”的良知,去促进、帮助所有的他者实现他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展示他的独特价值,在“仁爱”的光芒里,实现人格的多样性。

2. 当代“新仁爱”思想的具体内涵

我从中国哲学的立场出发,提出以“仁爱”作为当代中国人和东亚社会人与人交往的心灵起点,但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儒家。因为,传统儒家的“仁爱”是以孝悌之情为起始点,而当代中国及东亚社会所要提倡的“仁爱”思想应当在吸收传统儒家“仁爱”思想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以“自尊”、“自爱”为入手处,为起始点,然后推及他人。因此,当代中国与东亚社会已经或正在全面步入现代的工商业社会的过程之中,家庭生活及其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的孝道在当今社会很难实践,尽管它仍然有自己的价值。依据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及东亚社会的“仁爱”思想至少应当包含如下的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就精神实质来说:当代的“仁爱”思想首先应当以自尊、自爱为其逻辑的起点。而传统儒家的孝悌之情则可以作为其现实的起点之一,同学、同乡、同事、朋友之间的友情也可以作为现代实践“仁爱”精神的现实起点之一。这是因为现代生活的开放性与多元化的缘故。

第二,就实践“仁爱”的方法论来讲:个人实践与社会提倡结合,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并重。政治

形式的推进与文化教育的宣传相结合。但就其世俗性来说,“仁爱”的实践还是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由近及远,切近而思,仍然是实践仁爱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仁爱”的道德感情与道德心理不是一种宗教情感,它无需借助对于一个外在超越的神的信仰,而是要通过道德情感的感化与感动,再辅以道德文化的教育,从而变成一种道德信念(注意,不是宗教信仰)。

第三,作为一普遍的社会道德心理来讲:“仁爱”思想应当作为一种社会的基本共识而要大张旗鼓、堂堂正正地去宣传。要通过各种文化传播的方式宣传儒家的“仁爱”思想。而且,可以有一些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来推动这种思想。而从事这一公益事业的组织中的从业人员应当具有一种虔诚的态度,在现代社会以一种朴实的生活方式来担当这种道义,从而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就这一点来说,以推广“仁爱”为己任的社会公益组织的从业人员要向真正的宗教组织的从业人员学习,过一种非常简朴而又符合现代人健康常识的生活。

正如传统的“仁爱”思想需要全社会的成员“推己及人”一样,现代的“仁爱”思想更需要“推己及人”。一个人可能是“自尊”的,可能是爱自己的,却并不能保证他是尊敬他人,爱他人的。“个性独立”很容易被误读为“个人孤立”,“自爱”很容易被误读为“自私”。当人缺乏对“同类”的基本认识与关怀之后,人的自尊与自爱就极容易滑向“唯我独尊”与“自私自利”的境地。由于中国与东亚社会的道德文化传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提倡以“仁爱”作为中国人与东来社会相处的心灵起点,正如在基督教传统里提倡以爱上帝的作为心灵的起点一样,不仅能为外在的社会秩序提供内在的人性根据,而且还将会起到化解后现代思潮负面影响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当代中国与东亚社会区域合作的过程中,提倡一种“新仁爱”思想,可以为东亚社会的提供一种文化共识,增强东亚社会的认同感,也可以消除东亚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感。

三、儒家的心性修养理论与当代工商业社会的个人性修养

儒家的“仁爱”思想不仅在国际政治生活与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仍然能起到积极作用,在个人的心性修养方面仍然有他的用武之地。就个人的家庭生活与日常生活而言,孝悌之情的培养对于人的仁爱之情的养成仍然有积极的正面意义。而具备仁

爱伦理情感的人们,在自己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也可以发挥出积极的社会意义。

1. 孝悌之行,践仁之始。在孔子时代,孔子及其弟子们都特别强调孝悌德目的重要性。对于为仁之方,孔子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其二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孔子的弟子有子,则第一次明确地将“孝悌”看作是“为仁之本”——即践仁之始端。应该说,这是有子在深刻、准确地领会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之后,在实践层面对孔子思想的一种新发展。“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此段话中仁与孝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论语》的注释史上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本文暂时采用宋儒的训诂及其哲学的解释思路。“本”字,朱子训为“根”:“本,犹根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而程伊川对“孝悌为仁之本”一语专门有辩证性的解释,清楚地揭示了孝悌与仁的关系:“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在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儒家是一个非常重视人的生命经验而又不局限于生命经验的思想体系。“仁爱”是一种博大的伦理情感。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让人培养起对同类的关爱之情,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关键的问题。现代社会中,家庭生活仍然是我们人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我们在18岁之前的许多生活习性,特别是为人处事的经验性方法,都是从家庭中获得的。古典社会更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家里都不能爱自己的父母、兄弟,那么他在社会上还能够爱其他的同学、同事、甚至是普通的陌生人吗?因此,培养我们人的爱的伦理情感最直接、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从孝悌做起,然后才有可能推及他人。当然,从逻辑的周延性看,有了孝悌之情不一定必然地保证人能爱其他陌生人;但反过来看,如果连孝悌之情都没有的人,是不可能爱任何其他陌生人的,甚至会把我们现代世俗社会中奉为圣经的爱情对象也会当作一种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工具。

2. 忠恕之道,践仁之方。如果说通过孝悌之情来培养人的仁爱之心,是通过原始组织——家庭生活形式来训练人的道德情感,那么“忠恕之道”,则可以看作是儒家培养“仁爱”感情的普遍的心理方法。这种方法超越一切场所的限制,而是一种针对人的现实心理提出的一种人文化成的高妙方法。统而言之,“忠恕之道”就是推己及人之道。析而言之,忠谓尽己,恕为推己及人。晋人王弼释是这样解释“忠恕”二字的:“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元人戴侗训“忠”为:“尽己致至之谓忠”,训“恕”为:“推己及物之谓恕”。

对于忠恕之道的重要性与具体方法,《中庸》一文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而《大学》一文则从反面阐述了恕道的重要性,说道:“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孟子》一书对“恕道”亦有自己的解释,如孟子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这种以己心去忖度他人之心,即是“恕道”。

这些典型的材料都表明:忠恕之道,犹如持规矩以定方圆一样。故《大学》又称“忠恕之道”为“絜矩之道”。《大学》云:“所恶於上,毋以使下,所恶於下,毋以事上;所恶於前,毋以先后,所恶於后,毋以从前;所恶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恶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絜矩之道也即忠恕之道,而“忠恕之道”就是实践仁爱的普遍的、具体的心理方法。

有关“忠恕”之道内容,历代学者多有论述。在我看来,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钱大昕的论述颇有新意。他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发展了原始儒家的“忠恕之道”,提出了“帝王忠恕”、“圣贤忠恕”的新概念。他说:“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帝王之忠恕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圣贤之忠恕也。离忠恕而言仁,则为煦煦之仁;舍忠而言信,则为轻轻之信。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而有礼矣,其横逆犹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是忠为仁礼之本也。《春秋传》曰:‘上思利民,忠也。’《论语》曰:‘言思忠。’又曰:‘主忠信。’子张问政,则曰:‘行之以忠。’子贡问友,则曰:‘忠告而善导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盖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舍忠而能行者。后人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殉国为忠,而忠之义隘矣。’^[2]

更进一步,钱大昕将“忠”看作是“仁礼之本”,

并且认为自天子以至庶人,都要以忠为本。他批评了“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殉国为忠”的狭隘、残忍思想,含蓄地批评了专制帝王宽以待己,严以责臣的专制政治伦理,可以看作是18世纪中国进步思想家对原始儒家“仁爱”思想的一种发展。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儒家以仁爱为核心的心性修养理论,也可以为实际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提供一种良好的个人德性。

3. 修身、推恩与推行仁德仁政。《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由近及远的践仁方法,是“四书”系统成为中国士人阶层主要经典之后主流的践仁方法。而宋以后的儒家思想对于东亚社会的影响也逐渐地扩大。《大学》认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用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

除《大学》之外,孟子又提出“推恩可以保四海”的外推方法。这是孟子对孔子“仁爱”思想发展的结果,他将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思想,认为执政者如果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么治理天下就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

在宋时代,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要求人们以“大心,体万物为一体”的内省方式来实现仁爱的理想。如张载在《大心篇》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二程、朱子都非常重视仁者与天地万物相通的一面,而且常以身体的麻痹不仁为例,从反面形象地论证了仁者与万物相感通的道德情怀。

而到了清代,像哲学家戴震重新提出“以情絜情”的方式,来实现人的世界的合理化。他说:“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然后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才》)如此等等,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践仁”方法:由近及远。

要而言之,儒家为了实践“仁爱”的理想,发明了一系列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的方法。这种实践仁道的方法论路径,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它的现实价

值。再好的规则,如果制定规则的人都不能执行,这种规则很难有良好的社会效果。身正才能正人,身不正很少能够正人。

结语

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概略地阐述了儒家文化在当代中国及亚洲社会复兴的可能性及其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试图以先秦儒家的“王道天下观”为原型观念,发展出一套新的天下和平的国际政治理论;以先秦以及后来儒家不断发展的“仁爱”观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与基督教可以对话、平行的人际关系理论;以先秦及宋明儒学的心性修养理论,发展出一套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个人心性修养理论才以及现代儒家式的“为己之学”。这种思考目前还很粗糙,需要进一步的深思。但贯穿文章的基本意图应该还是明确的,即儒家文化的复兴必须以解

决现实世界与个人的生存难题为己任,努力发掘儒家文化传统中优秀思想观念并加以现代的转化。只有这样,儒家文化文化才能在现代的工商业社会中找到自己生存、发展乃至复兴的时代契机,从而为中国、为东亚社会提供一幅融合西方基督教文明,同时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的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生活世界图景。

[参 考 文 献]

- [1] 圣经·新约(中英对照和合本·新国际版)[M]. 香港: 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04:307.
- [2] 钱大昕. 忠恕[M]//嘉定钱大昕全集(柒),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483—484.

(责任编辑:谢光前)

Of Three Aspects and Possibilities about the Resurgence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WU Gen-you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Wu 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resurgences should unfold its new discussions from three aspects. Fac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onfucianism should,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kingly way, develop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ideal to promote world peace. For the point of uniting people, Confucianism should,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benevolence, develop a new benevolence theory to establish a spirit and moral belief system to contend against Christian theory. For individuals' condition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society, it should develop a set of moral practice philosophy, which can provide effective methods to cultivate individual morality, and develop the study for oneself with Confucian style.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Resurgence; Confucian Kingly Way; New Confucian Benevolence; Cultivate Individual Morality